

在全国抗击“新冠”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，江汉同志戴着口罩端坐在英模群体之中，现场镜头晃过他那英武的眉眼和挺拔的坐姿，就被眼明手快者截屏发到写作团队群中，大伙一片欢腾，因为受勋的英雄就是自己熟悉的“身边人”，自己有幸亲眼见证过他的英雄之举。我就知道这天是个黄道吉日。四个小时后，我收到重磅消息：《抗“疫”者说》拿到了“通行证”。这让小伙伴们又燃且嗨，沉潜几个月的都因此跃出了水面，我们终于可以荡起双桨，书成之时便是祝捷之日。

关于这场庚子战“疫”，我们的言说自是无法穷尽，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笔酣杜康，只得诸君公开卷品。反倒是这部书的养成之路，几乎就是一场草根传奇，有必要回顾梳理作个交代。

在“新冠”疫情发生之初，一切行动的后果都是未知的。什么也不做是世上最难的行作为艺术，为打赢这场抗击疫情阻击战，所有人躺在家里隔离两个星期，这竟是最困难并且最考验智慧的举国措施。面对如此重大现实的暴击，身为这场抗“疫”战争的践行者、见证者，我要为一线抗“疫”战士立传，弘扬志愿者的献身精神，展现咸宁人勇毅笃行的风貌。湖北人“不眠周”的英雄血脉，为人民书写出有道德、有温度、有筋骨、有血性的纪实作品。

于我而言，相比投身战“疫”的压力山大，写作抗“疫”将陷入更大的不确定——同样是自发行为，前者有组织保障和战友依靠，后者则与湖北作家赛跑、与全国乃至全世界作家对决。这不仅是自我期许，更是一种价值判断。跟那些一线的医护、公安、义工比起来，某些囿于书斋的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嘶鸣，经常显得隔靴搔痒，说实话，他们的所谓“启蒙”甚至有些自以为是的成分。曾文正公早就说过：天下事，在局外呐喊议论，总是无益，必须躬身入局，挺膺负责，乃有成事之可冀。我辈借先人圣贤之名，逞后浪奔腾之勇，既要说话人，还要干实事。一句

闲窗捉笔，杜撰一篇小说时，其开端与结束可能都是偶然的、被动的。写作者大概唯有对中间进行部分能勉强把握住一点主动性，其余则只能听天由命。因言说一种思绪，本身乃是“倩女离魂”之学。故无论古今，最好的小说，往往还会带有一些未完成的开放性或伟大的“缺憾”。我记得早年读南朝刘义庆《幽明录》，便有一则云：硖山下有眩潭，以视之眩人眼，因以为名。傍有田畝，昔有人船行过此陂，见一死蛟在陂上，不得下。无何，见一人，长壮乌衣，立于岸侧，谓行人云：“吾昨下陂，不过尔，可为报眩潭。”行人曰：“眩潭无人，云何可报？”乌衣人云：“但至潭，便大言之。”行人如其言，须臾，潭中有号泣声。

这篇志怪只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。潭中究竟是何人，什么怪物，谁在哭？刘义庆并没说，却又引来观者无限遐想，并预言了某种存在的荒谬性。而且，这一则当初在某些版本中还被刻意放在了该书卷首，可以说用心良苦。当然，无论志怪还是志人，幽明玄思，在汉语古籍里多如牛毛，也并非异端故事才有的独创。正如鲁迅所言：“六朝志人的小说，也非常简单，同志怪的差不多。”如《太平广记》第三百三十九卷“军井”一则，写一人用绳子下到某大井之底去寻某死者尸首，但等拽上来时，人已痴呆了。据他说是看见了井底有“城郭井邑，人物甚众，其主曰李将军，机务鞅掌，府署甚盛”云云，然后便惊恐而逃。仓皇间，他连找到的尸首也忘了带出来。同样，寥寥几行写到此，原作者永远搁笔了。古人的意象创作多是隐喻与含蓄的典范，即：把批评的自由、思维的拓展与更多的故事可能性，都留给了并未写的那一边，留给了虚无。眩潭可以说为“玄谈”之谐音（潭也通潭，如冯梦龙有《古今谭概》）。死蛟化身的黑衣人是对深渊的凝视，又何曾与西哲所言“凝视深渊太久则会变成深渊”之论有悖？“军井”难道不就是一座城市暴力系统的小模型吗？纵观古籍，皆可微言大义，空间设置无论渊潭、石窟、山洞、虎穴、海底还是深井等，其映照出的焦虑感，乃至恐怖感也可进入某种现代性吧。因小说凌空之幻象，本身又是一种建筑在叙事之上的智力漏洞。空间不过是观念的投影。

汉语的美学在于似曾明言，镜鉴明言，却又羞于明言。写小说也像一种不断坠落的过程。伏案太久之人，迫于文字生涯这奇特癖好的吸引，大概很多都会有这种失落感。因伟大的写作必须“脱离现实”，让文学取而代之。记得卡尔维诺便有一篇《坠落》，写一人悬浮在宇宙真空之中

这世间美好和险阻 都与我环环相扣(代序)

□程文敏

话，我要发动一场抗“疫”战士记录抗“疫”一线人和事的写作战争。

我开始小马拉大车，不断寻求各方襄助，也一路遇贵人指点。2月17日，我通过微信向著名评论家、作家吴义勤先生报告战“疫”情况和创作设想，次日他就委派编辑向萍女士全程跟踪并提供智力支持。而后，咸宁市委、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知道我的创作计划后，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。3月18日，著名作家、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先生获悉，当即与省作协党组商量立项支持。后来，文学圈很多朋友都知道了，社会各界人士也表示关注和支持。广而告之激励了团队士气，却也让我们只能破釜沉舟。

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：要想每天元气满满，必须做个学思践悟的少年，早上敬自己一碗鸡汤，晚上再打一针鸡血。结果好坏不重要，努力奔跑风雨兼程，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到处筹人拉笔杆子，动用一切人脉资源，拼尽最后一点人品，搭建起平台写作班子，都是各单位的年轻骨干，都很热血，都有干劲，只需要抛开公文习气，尽快提升文学气质。并非我有什么过人之处，只是我一直在寻求“最大公约数”，找到了人们的“利益共同点”——不管是支持写作项目的，还是加入写作团队的，都有那么一点人文情怀。总之，我全面撒网，把朋友圈吃干榨尽，时至今日仍有人戏称我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被我裹挟进来的直接参与者36人，采访一线抗“疫”战士200人以上，包括但不限于湖北省咸宁市（涵盖武汉、黄冈、黄石、荆州、鄂州、恩施等地）各级干部，医护、疾控、公安、民政、交通、发改、教育、复工、媒体等各条战线、各个系统的人士。

那些组织协调工作之烦琐毋庸赘言，反正我见人就烧香拜佛，逮住一个活口就忽悠，将貌似困难得不可能完成的写作任务，赶在五四青年节完成了初稿。我晨昏颠倒、废寝忘食，摆开拼命三郎的架势，并以此感染团队成员，时常想到什么就在群里噼里啪啦，凌晨两三点甩出一篇修改稿对比参照。

这本书的写作过程，好比九头鸟，天运九转，九死一生。各个环节不堪回首，现在想想都头皮发麻，有种绝不想再来一次的后怕。我既要统筹全局，又要操控每个细节，包括带队采访、素材挖掘、录音整理、分头改写、交叉作业、统一文风、润色校改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搜集各类文字材料几百篇、两三百万字，录音整理稿、人物素材近百万字，成品稿件52篇，近50万

字，先后六易其稿，最后删改仅存35篇，38万字。这不是遗珠之憾，而是腰斩之饮恨，幸好看到书稿清样焕发出断曹维纳斯的光芒，大家也就宽宥了我和责编的“狼狽为奸”。经此一役，有人说我是打不死的“小强”，作为一名基层作者，天知道我是怎样乘风破浪的。其实，我只是在模仿先贤和身边的领导。为今之计，要做成一桩功业，就必须和光同尘，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，能做的事做到极致，其余的交给时间和命运。

本书涉及的层面比较广泛，从上至下一盘棋，采取自述与采访相结合的方式，深挖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战斗故事。我天真地认为，这是一本平凡人的英雄之书，讲述每个一线抗“疫”战士最想说、并通过他们的不同说法、不同故事、不同瞬间，书写大疫之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感受人故事。从普通人的视角展示出生生至上、举国同心、舍生忘死、尊重科学、命运与共的伟大抗“疫”精神，进而展现各条战线的复杂、艰巨和曲折，使文字的性质能够配得上战线的磅礴力量。我们希望这些篇章尽可能全方位地再现湖北各地的抗“疫”现实，尽量贴近文学品质、纪实意义与文献价值三位一体且俱佳的目标，成为一部民众抗“疫”信史。

当然，上述评价指向的是一个理想峰值，带有敝帚自珍的成分。事实上，生活和写作总是充满遗憾的，我个人偏爱拥抱残酷真相。如果你对“疫”本身有一丝好奇，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。我的虚荣心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希望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喜欢《抗“疫”者说》，并且原谅我的鄙陋。毕竟，一线抗“疫”者们曾经拼过命啊，虽然绝大多数时候，这些人只是白天阳光下极为普通甚至不为人知的微光，是疫情这个“黑洞”让这些光芒凸显了出来，且显得着实耀眼，不管什么时候回想起来，都让人流泪地耀眼。

“纸船明烛送瘟神，万类四时竞自由。”写作此文的此时，疫情仍然处于进行时，“新冠”病毒依然在不时警醒每一个人：人类是命运共同体。任凭时空流转，我们都向往温暖，只有爱才是永恒的共性需求。最美的时光就在当下，即便终日蜗居在阴霾里，我们还是要不仰望星空，并歌颂这世间一切似乎与你无关却又与你环环相扣的初心和善良。

感谢为本书的诞生提供帮助的所有人！向为抗击疫情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，向在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同胞们，表达深切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！

（摘自《抗“疫”者说》，程文敏编著，作家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）

《恶魔师》序

□杨典

坠落，再坠落，不停地坠落。他虽不知会落到怎样的大地上，却亦觉得美妙非常。他只为这“不断坠落”而感到幸福。一种如迪诺·布扎蒂用《无期徒刑》来表达有限的自由，若菲以《断头台》来讽刺暴力系统的快乐，科塔萨尔写《魔鬼涎》（即《放大》）来表述追求真相或有与无之关系，或是冯内古特发明《时震》来预言时间的分叉等，世间以小说而令人悖谬思想、反抗现实之作家不计其数，皆因他们深谙“世界只能倒着去理解，顺着去经历”的道理吧。当然，作家都是狭隘的。而这共同的狭隘与创造形式，又构成了普遍的写作景观。整个文艺都只能是真实世界的棱镜而已，自有其无用之用。好的文学从不能真正批判具象的历史，只能总结个别的人性。这有些像18世纪英哲曼德维尔(Bernard Mandeville)用《蜜蜂的寓言》表达过的那个著名悖论，即：私人的恶德，公共的利益。作为私人产物的文学即是如此。每个作家都在追求自己最私人化的隐喻、恶、虚荣、伪善、色情、语言、叛逆与想象力，以及作品出版后带来的名利。而且大多数时候，为了编撰一种奇异的幻境和危险的思辨，还不得不将解构与叙事学无意识中完成了蜂房世界的主观繁复，就像无用的“山木”与有用的“鸣雁”，也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得以个体幸存。故曼德维尔的寓言与庄子的寓言也并不矛盾。

写作有时也是一种集体(个体)无意识。花二三日写或读一篇小说，与花去一生来阅尽世间事，皆如入漆黑的迷宫。无论时长，总是要等到结束之后，才明白它们似乎是早已被设定好了的。写作之人只不过是被动一种莫名的巨大激情，从背后推动着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去做了一件本来

与自己无关的“私事”。当然，一本书，尤其小说，一旦独立出去，最终也不会结束于这件“私事”。写作最终还会被无限的读者化为一种对“公理”的探索。如按梁启超先生1902年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中所言，小说在中国甚至有着比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之于欧洲思想与生活更重要的性质，远超过文学的边界。所谓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术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理”云云。当然，小说从“私事”而发展变为“公理”是一个漫长而又无法回避的过程，而且20世纪以后，这势头已渐渐处于颓势。这一点，无论西方文学还是中国当代都是如此。但追忆过去，小说对世界之改变，的确曾远过于今日任何媒介，包括杂志、电影、电视甚至网络。小说曾算是唯一堪称与人间社会新潮、革命、骚乱与历史剧变同步的艺术，是从精英到普罗大众皆为之心激发的文学。这从18、19世纪的西方到冷战前后的欧洲、印度或日本等国的文学史都能看出。中国近现代也类似，如在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阿英《晚清小说史》、刘心皇《现代中国文学史话》(其中关于民国小说与革命的梳理)、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或夏志清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与夏济安《黑暗的闸门》等书中，小说的社会作用都被当作核心问题来谈，而作家个人的精神与趣味倒放在了其次了。但写小说之人最初都是不自觉的，甚至只是率性而为的。一个好的小说家，其实并不在乎其作品未来会有什么社会意义。私事或公理，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写作只是为了用语言的胜利代替生活的失败，希望能移形换影，从而拯救自己在面对存在与虚无时的焦虑。仅此而已。尤其在今天，再好的小说似乎都已边缘化。写小说之人倒是可以更加放松了，不以任何外界的意义束缚自己的叙述。或许这才是文学的本义，是小说之真境界，语言之观自在。也未可知。

本书收入的几十篇短札，也多是急就章，写了诸如轻功、花关索、大异密、父子、沙皇、鼻祖、

作者的这部小说，历经十年构思，是以家曾祖父、祖父、母亲几代人的经历和故事创作而成。

曾祖父郭有品，字鸿翔，1853年出生于福建龙溪县角美镇流传村一个农民家庭。自幼丧父，由母亲抚养成人。1869年，16周岁的郭有品只身下南洋，前往吕宋(今菲律宾马尼拉)当“水客”。他为人忠厚老实，乐于助人，深受乡人侨胞信赖。1880年在家乡流传村和菲律宾吕宋，创办专为华侨递送信件和物资的侨批信局，取名“天一批郊”，后更名“天一信局”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家民办邮政机构，较清政府的大清邮政早了十多年(大清邮局于1896年3月20日由光绪皇帝批准开办)。

天一信局的主要业务是替华侨侨眷代写并收寄传递书信，也兼着为他们捎带各种生活物资回乡，接济家用。侨批“飞鸿”成为华侨、侨眷重要的情感生活纽带，透过一封封信函和一件件侨汇物资，联系着海外华侨与国内故乡亲人的骨肉情怀，展现华侨移民史、创业史的生动画面，也是那个年代我国金融史、邮政史的重要篇章。

为了加快流通速度，曾祖父郭有品选择在厦门港设立天一厦门总局，考虑到闽南华侨众多，为便利侨眷取信，他又在附近漳州、泉州、安海设立分局，每批华侨书信到达天一信局流传总局，天一信局就在楼前升起“天一”旗，旗高数十米，附近几个村庄远远都能望见，侨眷由此得知海外亲人的信函或侨汇物资已到，便互相转告前来领取，未领取的则由天一信局于次日分别投递。

天一信局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，侨民寄批(即信件)，信局须发给寄批者“票根”，以备查询。收解侨汇手续正规，定明汇款费率，雇用固定信差。侨眷收到信件后需要在回批(回执)签收确认，遇上不识字的侨眷则托信差代笔并按上本人手印。回执再经信差之手，送回侨批局，最后返回到寄信人手中，寄信人得知家人已如数收到信函或钱物时，这枚带有“往返”功能的侨批才算旅程完结。这样的批信寄发流程类似今天的邮政双挂号或保价快递，只不过时间上早了一百多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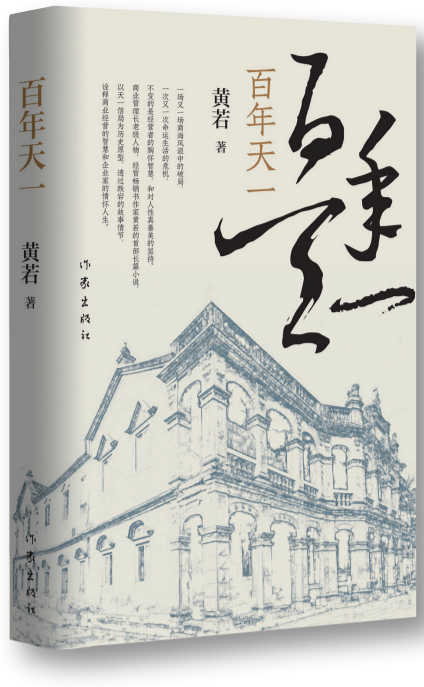
据《厦门海关十年报告(1892~1901年)》记载，1898年至1901年，进入厦门的外国轮船1086艘，帆船181只，厦门海关共收邮件1018570件，汇票93442美元，近一半的邮件是经由天一信局投递的。

郭有品事业有成后，热心支持孙中山、黄兴、陈少白的兴中会(即中国同盟会前身)，为推翻清朝统治，开创共和捐款助力。天一信局还存有黄兴亲笔题写赠与曾祖父郭有品的牌匾“造福乡梓”。小时候我见过这块金字镌刻的黑色楠木横匾，可惜后来在“文革”期间被毁。

曾祖父郭有品于1901年在厦门染上鼠疫不治而亡，享年49岁。后由郭有品二子郭和中即

□秀琼

《百年天一》序



家祖父和他的兄弟，及孙女郭素月即家母两代人协力，秉承先人遗愿，精心经营天一信局事业。天一鼎盛时期业务遍布中国沿海及东南亚各国，分局多达33家，其中国内有厦门、安海、香港、漳州、泉州、浮宫、同安、上海、港尾等9家，国外有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越南和新加坡等24家。1920年，天一信局当年经手侨汇总额4400万元，占该年闽南地区侨汇总额的三分之二，成为民间侨批银信的旗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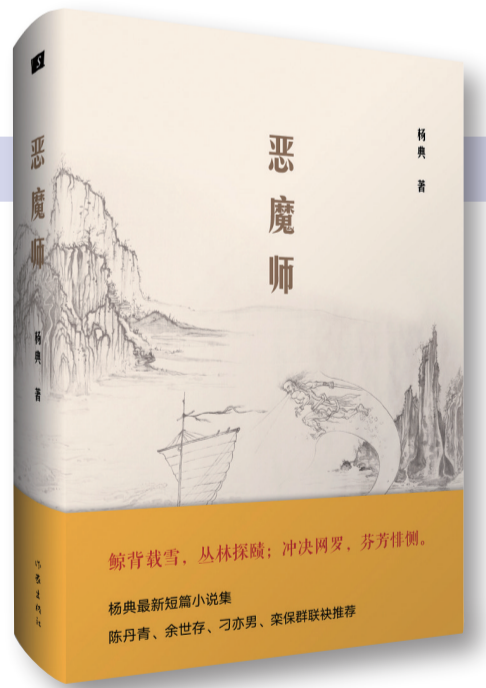
天一信局的司训是“以信为本”，这是曾祖父郭有品创办之时明确立下的规矩。在一次由天一信局押运侨汇银信返乡的海途中，船遇台风突袭沉没大海，全部物资银元顷刻沉没海底，所幸随船人员性命无虞，郭家变卖田地家产，仅存存的收汇名单款项一一照价赔付，郭家损失惨重，但此事在南洋华侨中传为佳话，业务因此更为兴旺。

我小时候随母亲住在流传村天一老宅，后随母亲和五姨到厦门鼓浪屿居住，抗战期间日本军队先是入侵厦门，后来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占领鼓浪屿岛，我和母亲等人逃离鼓浪屿，历经颠沛流离，回到流传老家。

天一总局旧址位于龙海流传村，为先祖父郭和中及兄弟出资兴建，旧址现今仍存，建筑中西合璧，有浓厚的南洋侨商建筑特色，是一处重要的商业及文化历史遗址。“文革”期间该址受到严重破坏，许多牌匾、文物被毁，墙壁篆刻雕塑被凿，原办公室改为储物库，所幸整体建筑仍然保留。2006年，天一总局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百年天一，岁月见证了郭家几代人的风风雨雨。如今太平盛世，国强家兴，郭家后人健康成长。先人在天有灵，当感欣慰。我年近九旬，经历过岁月变迁的沧海桑田，深感今日信息化快速发展时代，缅怀先人事迹，奉人以诚，经商以信，乃永不过时之本。

（摘自《百年天一》，黄若著，作家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，作者秀琼为天一一信局创始人郭有品曾外孙）



飞头蛮、心猿、妖怪、逃犯、被往事之罪困扰的人或唐代诗人等，有些并无主人公的名字，只是想记录一些癖性与观念，一些只能转换为幽闲消遣的悲怆记忆。好在这些小说大都是继《鹤笼记》之后一年多来所制之新篇。说是节外生枝也罢，说是个人实验也行。我的目的就是尽量接近虚构的究竟真。因中国古代小说曾被叫作稗官野史，但我历来不太相信一切“历史”。清儒章学诚言“六经皆史”，但究竟什么叫历史？谁来判定真伪？写历史的人自己都不一定见过历史，靠的往往不是事实，而是当时当地之观念。文史哲也不分家。我是愿意把诸子百家、二十四史、古诗或十三经也都当作小说或志怪来读的。我相信贾宝玉之戏言有理：“除四书外，杜撰的太多。”在我眼中，即便整个“四部”都可以入“说部”，是一系列被各种意识分类管理后的“观念小说”而已。况且，若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诸子十家者流”之排列，小说家恰在第十家，据说“君子弗为也”。可前面那些最重要的儒家墨法等九家之书，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与帝制传统的解体，具成“干尸”。即便想加个“新”字，也是勉为其难。唯有小说家，因本来即虚构之学，故反而能千古不易，并直接转换成了现代性与世界性。这也是汉语积累的元气与幸事。毫无疑问，为了接续这元气，我的期望自己的写作能在过去的思维冲锋

与观想折叠中，再次升级，甚至摆脱一切小说传统，达到某种无序的意外(如本书最后的那篇《十翼》)。虽其中也有取自古籍的演绎故事，刁钻修辞，但说到底，一切小说都是可以横空出世的、毫无背景的残酷虚构，彻底的无。书斋坐驰，神思日行八万里，不与任何旁人相勾连。写作可以是完全“无意义的表达”。只是近现代以来，从徐振亚、喻血轮、鲁迅、郁达夫、蒋光慈、施蛰存、李劫人、废名、汪曾祺乃至刘以鬯等那几代小说家尚未有机会去做，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汉语小说之实验也始终未抵达“无意义”之究竟吧。当然，我也许写得仍很不够，或者实验已失败，且待未来再看吧。忽然想起张爱玲早期就写过一篇短札《散戏》，讲女儿南宫嫔，在观戏返家途中，一会看看月亮，一会想想婚姻，心绪飘浮若旧上海街头的一位最渺小的尤利西斯。最终，当她在一个玻璃窗前站了一会，“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，可是已经到家了”。这篇笔墨东摇西照，纷纭凌乱，并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。过去我读时，完全不解解者到底想说什么。可后来每念及此作，却又常叹其敏感之奇绝了得。因“南宫嫔”的好处就在这里——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有开口”。从文本气息而言，我的作品当然完全与张派无关。我本是个野蛮人。我最认同的写作是直觉、猛志与对规律的否定。但这本书中的短札小说，大多也是想在激荡的思绪中找到能冲决一切言赋某种“无意义”吧。这“无意义”是古代志怪寓言赋予我的血统，也有晚清与民国文学，乃至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学云集到我身上的脾气。血统也许并不高贵，脾气也的确不好，权且集中在此作一番骂骂咧咧、文字瘴而已。过去写《懒慢抄》时，似也有此意。至于谁在我的书中还看到了什么“真相”或暗示，我虽不会反对，但终究是不太重要的事。

长话短说：书名“恶魔师”，本义可在文中参阅，此不赘言。当然，若用“十魔军”“心猿”或“摸骨”也可以，皆是取自其中一篇之名。整理此书时，正逢春瘟肆虐，各种疾苦消息每日频传，昏天黑地。远望世间，真状若“潭中有号泣声”，却又无法说出到底是何物，只能心照不宣，并令人对庚子年的深渊望而生畏。惭愧的是吾辈懵懂于科学，无补于现世，只能足不逾户，面壁思过，唯愿山河无恙，车书万里，人与岁月并行。在此心乱如麻的禁闭时期，作了这些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，还望读者诸君体谅吧。是以有序。

（摘自《恶魔师》，杨典著，作家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）